

全球史译丛

ReOrienting

the 19th Century

Global Economy
in the Continuing Asian Age

19 世纪大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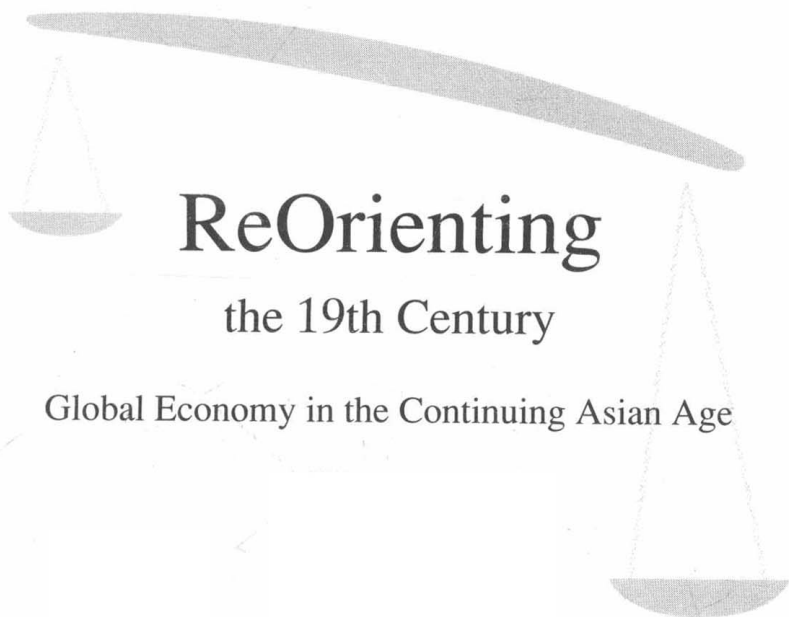
[德] 贡德·弗兰克 著

[美] 罗伯特·A. 德内马克 (Robert A. Denemark) 编 吴延民 译

重新定向 19 世纪的亚洲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Andre Gunder Frank

中信出版集团



ReOrienting the 19th Century

Global Economy in the Continuing Asian Age

19 世纪大转型

[德] 贡德·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 著

[美] 罗伯特·A. 德内马克 (Robert A. Denemark) 编

吴延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 世纪大转型 / (德) 贡德·弗兰克著; (美) 罗伯特·A. 德内马克编; 吴延民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7

(全球史译丛)

书名原文: ReOrienting the 19th Century

ISBN 978-7-5086-8855-8

I. ① 1… II. ①贡… ②罗… ③吴… III. ①世界史—研究—19 世纪 IV. ① 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1885 号

Reorienting the 19th Century 1st Edition / by Andre Gunder Frank / ISBN: 978-1612051253

Copyright © 2015 by Paradigm Publishers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aradigm Publishers,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Paradigm 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中信出版集团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19 世纪大转型

著 者: [德] 贡德·弗兰克

编 者: [美] 罗伯特·A. 德内马克

译 者: 吴延民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0377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855-8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III 见识城邦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全球史译丛》

主编

刘新成

编辑委员会

李伯重 李庆新

梁占军 刘北成

刘家峰 刘文明

刘新成 施 诚

王立新 夏继果

向 荣 岳秀坤

“全球史译丛”总序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 20 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 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 之后演变成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 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一般认为, 1963 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 多年来, 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 2000 年全美已有 59% 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 5 年后又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 全国 26 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 14 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 2005 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 75% 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 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 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 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 2005 年在德国召开的“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 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 2001 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 在 2002 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 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 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 但同时他们也承认, 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 虽然全球史尚未被列入正式课程, 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 许多历史学家主张, 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

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和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的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 40 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

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史学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

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 600 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 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

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ish Chakra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蒂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儿，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

分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 21 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于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20 世纪 80 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

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年5月

译者序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是一位风格非常鲜明的学者，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当中，他始终以一名激烈批评者的形象示人。这种情形在学术界并不多见。1990年代之前，弗兰克致力于对西方政治经济霸权的批判，他那时分析和批判的对象，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1990年代开始，弗兰克的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向，从依附理论转向了全球史。他不再认为资本主义是近现代世界的独有事物，也不再认为世界各地在1500年左右才开始连成一体。弗兰克这时转向了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他所分析和批判的对象，也变成了欧洲中心论及其在学术研究中的表现。弗兰克在这一新取向下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二：一是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白银资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另外一项即为本书。

大家对于《白银资本》应该已经比较熟悉了，我们这里看到的《19世纪大转型》即为其延续。在这两项先后问世的研究当中，弗兰克的工作是一以贯之的：一是颠覆西方原有的社会及历史理论，他认定它们充满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与误读；二是尝试着建构起“真实”的世界历史图景，他认为这需要对世界史做全球性、整体性的考察，而不能仅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关注欧洲的历史经验。这也是他得以位列新兴全球史领域学者的原因所在。弗兰克之前在《白银资本》中断言，1500—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依旧在主导着全球经济，欧洲不过是一个凭借着美洲出产的巨量白银，幸运地搭上亚洲经济列车的小

角色。弗兰克在本书中进一步修正了他之前的观点，将东、西方经济实力对比发生翻转的时间点延后到了 1870 年。按照他的说法，大约在此时之后，东方才衰落了下來，西方才实现了兴起，东、西方之间才出现了“大分流”。弗兰克又一次挑战了学术界的“常识”，不过他的新奇观点有其自身的逻辑。

弗兰克对于“大分流”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彭慕兰等人的理解完全是两码事。简单说来，按照彭慕兰等人的理解，或者，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大分流”指的是西方率先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的工业时代，而世界其他地区仍滞留在经济增长愈发缓慢的农业时代。弗兰克在本书中提到“大分流”时，指的则是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翻转，或者说，西方取代东方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者。在弗兰克看来，“大分流”还意味着西方变身为“发达”（developed）地区，其他地区则从“不发达”（undeveloped）陷入了“欠发达”（underdeveloped）。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体系式的分析又回到了弗兰克的研究中。它是弗兰克在依附理论时期所倚仗的分析模式，后来在《白银资本》中曾一度变得踪迹难觅。当弗兰克之前在《白银资本》中，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依附理论时期的自己也列为批评对象时，我们还曾以为他已经告别了世界体系式的分析。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弗兰克在本书中所探讨的，是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而非“现代世界体系”。可是，我们也应该能够发现，弗兰克所考察的这个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背后有着“现代世界体系”的影子。从西方对非西方、发达对欠发达、获利对受损这三组关系来看，二者之间的相似性非常明显。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的话，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也颇为显著。首先是出现时间。沃勒斯坦和依附理论时期的弗兰克所讨论的“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于 1500 年前后，弗兰克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则出现在 1870 年以后。出现时间的不同意义重大，整个世界近代史的图景都因此而大不相同，不再只是西方的兴起和对外扩

张了。其次是形成机制。在沃勒斯坦等人看来,“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扩张,是现代资本主义出现和壮大的结果。弗兰克则在本书中主张,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的形成,是全球性的结构与进程所产生的结果。这样一来,弗兰克既否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殊之处,也否定了人类历史在1500年左右出现过断裂。再次是系统结构。“现代世界体系”由“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之间的双边关系构成,在这一体系中,“中心”依靠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从“边缘”和“半边缘”大规模地攫取利益。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则由全球各地之间纵横交错的经贸关系构成,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地区,通过复杂且不平等的多边贸易和支付网络,从欠发达地区大规模地攫取利益。

尽管有着以上这些显著差异,我们仍然可以将本书对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的讨论,视为一种世界体系理论式的分析,只不过,弗兰克赋予了它一副新的面貌。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也许就应该能够明白,弗兰克为何之前在《白银资本》中对全球经济的“中心”念念不忘,以至于让不少人误认为他滑向了“中国中心论”。这是世界体系理论式分析模式的特点使然。大体而言,1990年代之后的弗兰克,虽然决然抛弃了依附理论,变成了早些时候的自己的批评者,但并未离开世界体系理论式的分析模式。对于这一分析模式,我们还应该意识到:

……世界体系理论本身有其应用限度。它是作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对立面被建构出来的。后者在处理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时,持有一种明显偏向西方的价值取向。经典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界定为“现代的”,将西方以外地区界定为“前现代的”,认定后者必然的历史归宿,就是依照西方走过的道路“现代化”。这样一来,近代以来西方和非西方的不平等,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侵占与侮辱,都被“现代化”这样一种宏大议题掩盖了。世界体

系理论就是旨在凸显这种不平等，并对处于“中心”的西方加以政治经济批判。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视为一种批判理论的原因。世界体系理论的用武之地，是展现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并对处于支配地位的霸权进行批判；是探讨世界性霸权的兴衰更替，以从“体系”的角度来分析全球性竞争态势的变迁；是分析“第三世界”被侵占和侮辱的原因，继而为其指出改善处境的大致方向。世界体系理论之所以曾在“第三世界”大受欢迎，主要就是因其所关注和探讨的议题，正好迎合它们对西方的不满，以及对自身发展的诉求。弗兰克虽然对世界体系理论大加改造，使它展现出另外一种全新面貌，但并未打破其在应用范围上的限度。^[1]

传统上，世界体系式的分析通常被用于批判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弗兰克在本书中则将之用于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权，具体来说，将之用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和历史理论。初看之下，弗兰克在本书中着力探寻的，是“大分流”出现的准确时间，不过，如果我们多做一些思考就会发现，他想要确定下来的，是以英国为顶点的世界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出现的时间，或者换句话说，西方在全球经济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弗兰克想借此说明，之前诸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都过分夸大了欧洲在近现代历史变迁中的重要性，它们实际上遍布着欧洲中心主义所导致的偏见和误读。按照此种逻辑来看，弗兰克在本书中所提出的那些惊人判断，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说得通了。事实上，按照此种逻辑来理解的话，弗兰克本书的观点也会变得不怎么新奇了，因为，史学界早就普遍地认为，西方全面压倒世界其他地区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形，发生在 19 世纪后半叶。弗兰克只不过换了一种角度，将相关看法更具综合性，也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出来。当然，

[1] 吴延民：“变了形的世界体系理论——评贡德·弗兰克《19 世纪大转型》”，《全球史评论》第 12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 06 月，第 232—233 页。